【有感于思】 **阎晶明**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微困扰

生活中总会有那么一些问题，它们看上去微不足道，但你总是无法立刻解决，迅速克服，它们几乎形成某种困扰，当时不能得到及时帮助，事后又懒得跟人探讨，所以它们可能不时地发生在生活里。我将此称之为微困扰。

举一个小例子。出门在外，入住酒店旅馆，就是进入一个新环境。感受更多的是方便，但随着条件变得更好，方便中也总会遇到一些让人费时费神的微困扰，比如，打开房间电视机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现在却不那么容易了。因为有了机顶盒，遥控板开关更加复杂，要么开不了机，要么就是打开了，屏幕上却飘动着“无信号”三个字。如果你毫无秩序地无序按动，说不定也能出现画面，你以为就是打开电视频道了吗？未必。你看到的或许是酒店的广告页。或者是专门写给你的一份欢迎入住语，很温馨，但也很雷同。要想看到电视频道，还得费不少工夫。本来就是随意打开扫两眼的事，面对这样的难题，索性作罢，算了。

但另一个微困扰却不是作罢就能算了的，这就是入睡前试图关掉房间里所有的灯。几乎每一面墙上都有开关盒，床头的左边、右边也各有一组开关。总是无法一步到位地关掉所有的灯，它们几乎是此消彼长地对人形成困扰。为了给客人提供方便，一进门的廊灯、小吧台的镜前灯，都有可能是非开关控制的感应灯。人一走近就亮，离开一段时间又会自动灭掉。所以即使你很辛苦地关掉了所有能找到的开关，发现还有一两处的灯依然亮着。再去摸索着试图关掉，反而又点亮了本来已经关掉的，很让人无语。如果房间里有一个总开关，“断电”还相对容易。但有时仍然会有一个地方亮着，那就是床头下面的所谓“夜灯”。根本不知道怎么才能关上它，就像窗帘没有拉严实一样，让人无法入眠。我就有那么一两次，因为无法处置这个看上去跟蜡烛光亮度差不多的夜灯，只好搬用枕头来遮光。

这些微困扰看似小环节，其实也给人某种暗示，仿佛个人的生活常识落后于社会的发展速度。但其实，“傻瓜”式的服务才是真便捷，一步到位的使用才是人性化的科学。以为然否。

【昙花的话】 **尤今** 新加坡作家

名不副实

在新西兰南岛的湖畔小镇瓦纳卡，看到这家以“Trout(鳟鱼)”为名的餐馆，大喜过望。

鳟鱼是淡水鱼类，栖息于江河流速较缓的水域或湖泊，少刺、肉质鲜嫩，无论是蒸、烤，还是煎，吃起来都光彩焕发，非常可口。瓦纳卡地处湖区，想必鳟鱼又大又肥，啊啊啊，鳟鱼那清鲜的甜味已经泛上我味蕾了。

在餐馆坐定之后，服务员送上菜单，然而，翻来翻去，令我纳闷的是，菜式居然以肉类为主，鸡扒啦、羊扒啦、牛扒啦，统统都有，唯独鳟鱼影踪全无。问起时，领班说：“我们餐馆没有供应。”我问：“是目前这个季节没有鳟鱼吗？”她面不改色地应道：“一年四季皆无供应。”我诧异反问：“既然你们不卖鳟鱼，餐馆为什么要取一个如此具有误导性的名字呢？”她耸耸肩，毫不在乎地说：“名字而已，爱取什么便取什么！又有啥关系呢？”

她的理直气壮令我瞠目结舌。

打个比喻，如果我们买一本烹饪书，书名是《鱼》，内容谈的却是各式肉类的做法，像话吗？如果说菜肴是一家餐馆“缤纷的内容”，商号便是它“庄严的书名”了。

一家“店名”和“菜单”全不挂钩的餐馆，我还能对它供应的食物有所期待吗？

名副其实——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顾客的尊重。

那天，听到领班的回答后，我站了起来，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不知不觉】 **钟红明** 上海《收获》杂志副主编

四川好人

古蔺位于四川盆地南部边缘向贵州高原过渡地带，乌蒙山系大娄山西段北侧，古称“蔺州”，蜿蜒绕行在山峦之间，一块块梯田铺满明艳的油菜花，忽而在左、忽而在右扑面而来，雾气氤氲，听见潺潺的流水声，就是所谓“七山一水两分地”吧。据说，著名的赤水河只有从发源地往下的49公里的流域可酿造闻名遐迩的白酒。这天傍晚，我们一行来到太平古镇。

太平古镇源自昔日繁华的“太平渡”，古蔺河在这里流入赤水河，古属古夜郎国地域，对岸便是贵州习水。明末清初，随着“改土归流”的实行，这里成为盐巴、布匹、中药材与土特产的物资集散地。人们在山脊上建起了层层叠叠的石梯，石梯路便是街道，两侧分布着盐号、客栈、商铺，便有了“小山城”的美誉。四百多年风雨冲刷着这座古镇，昔日的繁闹，依稀留痕，吊脚楼的白墙黑瓦，具有川南民居风格的木架结构的房子朴素、安谧、亘久。足音踏踏，我们去找一位“船工号子”的非遗传人胡敬华。1961年，毛泽东在会晤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时曾说：“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没有什么，四渡赤水才是我的得意之笔。”太平渡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四渡赤水战役”的二、四渡赤水河的主要渡口。而胡敬华正是红军的后人。

远远的，远处的廊檐下，看见一位微胖的长者，须髯霜白，精神矍铄，他把一张八仙桌擦得亮亮的，茶一泡，眉眼生动地讲述起他的红军父亲的故事——1935年1月29日，在习水县土城的青杠坡战斗中身负重伤，留在太平镇养伤，为了掩饰江西口音装聋哑人，靠打短工、帮人倒酒糟、挑井水卖为掩护……父亲1953年病逝，弥留之际，他手拿三块银元对7岁的儿子说：“这三块大洋，即使是我在最艰难的时候也舍不得用。你长大后，要回到江西省宁都县黄陂镇去寻找奶奶……”

胡敬华16岁就做了赤水河的船工，很快，成为船工号子的“喊号王”。他擅长创作“歌词”，“吆耶吆耶……嗨……嗨……，哥们儿齐出力哟……嗨……嗨……”船遇险滩时，端午节龙舟赛时，甚至，那个水边姑娘的轻盈，都被他灵活地编入号子里。机动船出现后，他的船工生涯结束了，《数板》《倒板》《大斑鸠调》《小斑鸠调》《抛河调》《进码头调》等赤水河的船工号子也失去了存在的场景，但转入陆地工作的胡敬华，并未遗忘，退休后的他找到了一种新的日常生活方式——向来访者讲述红军父亲的故事，却把红军故事与传统的船工号子结合，创作出独特的新船工号子……

离开时，看了一眼他的院子，瓦罐里不知名的花草蓬勃地生长，绿意盎然，一道红色的横幅上写着：四川好人……

【有一说一】 **廖俊平** 广州学者

写作是最后的救赎

人们常说：苦难的经历是人生宝贵的财富。我觉得这句话准确说应该是这样：苦难的经历记录下来才是宝贵的财富。

记录，就是写作的功能。因为写作，苦难才能成为宝贵的素材。

有句话因为安妮·埃尔诺的获奖而传播开来：“写作是最后的救赎。”这句话是我按照自己的理解翻译的，通常大家看到的译文可能是：“写作便成为唯一可以求助的形式。”

这句话本是一个古怪的法国作家让·热内说的，被安妮·埃尔诺引用作为其成名作《La Place》一书的卷首语(这本书的中文译本名为《位置》)。

埃尔诺引用的这句话在《La Place》的英译版《A Man's Place》卷首是这样的：May I venture an explanation: writing is the ultimate recourse for those who have betrayed。我觉得这句话里面的“ultimate”的意思应该用“最后的”或者“最终的”来表达才更准确。

对于写作者来说，表达可能是其次的，写作首先是一个自我救赎的过程，甚至，如上面那句话的通行中文翻译所言：是唯一可以求助的形式。

●随手拍

留住春天

□图文 唐红生

春天来了，许多人走出户外，享受春光。江苏句容葛仙湖公园柳树嫩芽初发，碧绿的枝叶轻拂水面，满目葱茏，几位妇女身着红衣，摆出身姿留影。

随手拍专用邮箱：ycwbwyb@163.com

【拒绝流行】 **曹林** 北京时事评论员

“建议专家不要建议”

这几天，年轻人在社交媒体被一个经济学家感动着，甚至是感激。是什么让遭遇严峻就业形势、易燃易爆的年轻人如此感动？是帮着找工作了，还是给了什么有价值的建议？不是，仅仅只是说了一句隔壁老奶奶都知道的道理：年轻人找工作，不看工资那看啥？

这个经济学家叫朱少平，他说：如果有人指责年轻人看着报酬来挑工作，那至少他是无知。不看工资该看什么？如果连生存都保证不了还找这份工作做什么？每一个人都知道收入高一点，但是你要获得更高的收入，必须提高知识和技能，社会应该创造更好的条件，年轻人只要不是好高骛远，我们都应该支持。——不少年轻人真是热泪盈眶，直言朱少平实在是专家中的一股清流，清流中的泥石流，能共情年轻人，说出了年轻人面对职场规训时最想回怼的大实话。

有人说，这个隔壁老奶奶都知道的道理，从一个经济学家嘴里说出来，只能说明这个专家都看不下去一些事情了。有人说，大饼是用来吃的，不是画的！不看工资？看门口地砖擦得亮不亮吗？你要说年薪几十万元，那个砖我给您擦得当镜子使。——找工作，谈钱，看收入，收入起码要能养活自己，这是多朴素、多基本的道理，却要从一个经济学家嘴中说出来，说明常识被扭曲得多严重。而一句如此普通的话，竟然都让年轻人感动大半天，又说明如今的年轻人多么“缺爱”“缺理解”，听惯了高高在上的训话，听惯了各种驱使他们去卷、去拼、去奋斗的规训，缺少来自专家阶层的基本共情。

什么叫人话？尊重人性、人情和人的基本需求，不与普通人的追求为敌，就是人话。为什么“建议专家不要建议”会刷屏，就在于有些专家的建议，实在不说人话。看看这些曾经惹恼年轻人的“专家建议”：没有工作的人，可以把闲置的房子租出去，或者去开网约车。对于不愿意去工作的年轻人，征收失业税。年轻人在公司附近租间房子不好吗？这样就可以节省通勤时间。你说，这些能叫“人话”吗？还有近来，在年轻人找工作的问题上，各种教训年轻人，以捡垃圾、摆地摊、卖大葱也很赚钱之类的新闻作示范，让年轻人不要眼高手低，不要挑工作，要放下身段，不要被学历束缚，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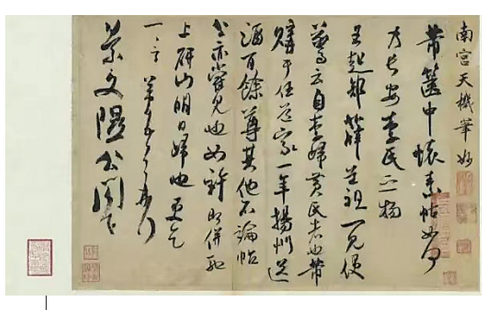
建议专家不要建议，这不是年轻人“反智”，而是这些“建议”带着一股浓浓的反智味道。这个背景下，说出一句诸如“找工作，不看工资那看啥”建议的经济学家，才让委屈的年轻人感动万分。

【如是我闻】 **李雪涛**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过程

在杜塞尔多夫生活的时候，我的朋友皮特的儿子克里斯蒂安上中学，他每周在莱茵河上划皮划艇一两次。有一次，我跟皮特一起去媒体港训练基地去看克里斯蒂安训练。克里斯蒂安要将皮划艇从放置的地方拿下来，放到水中，按部就班地穿上训练服，整个过程需要半个多小时。我觉得准备工作占用太多的时间，太麻烦。皮特却说，对于处在青春期的孩子来讲，这是最好的练习方式，也是培养耐心的习惯。

上个学期开始我每周和同事一起练习一次书法，他们都将我的纸墨笔砚准备好。其实如果没有铺纸、研磨、运笔的准备工作，只是来书写，就感觉失去了品味、享受的过程，所以我决定以后都由自己来做这些准备工作。速成的确是方便，但也让人失去了很多过程中的审美。



〔宋〕米芾《篋中帖》

仇春霞：再现『宋人千面』 四年『纸醉金迷』

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提供
文/羊城晚报记者 陈晓楠 孙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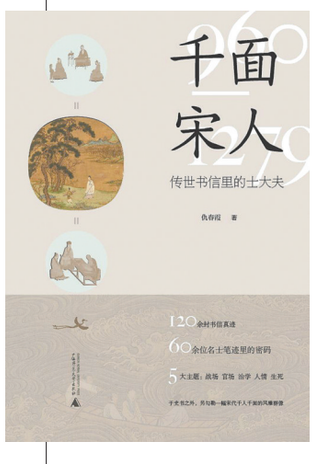
人们常说见字如面、见信如晤，在古人的书信往来中，我们究竟可以“窥见”哪些故事？近日，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的年度重点图书《千面宋人——传世书信里的士大夫》(以下简称《千面宋人》)，将宋代的人与事一一道来。

这是一部以“书信”为切口的宋史新作，作者仇春霞透过宋代士大夫之间的私人信件往来，为读者勾勒出一幅“千人千面”的宋代群像。书中收录了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苏轼等60余位名士的120余幅书信手迹，原件多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

2018年的春节，仇春霞开了一个新的研究专题——研究宋画中的题跋。题跋涉及书法与内容两个方面，当她沿着书法这个方向往前推进的时候，“不知不觉就掉到宋人传世信札的‘坑’里了”。在她看来，博物馆里的书信是孤立的历史碎片，比起枯燥的论证过程，她更想将碎片化的历史以“可爱的方式”讲给大家听。因此仇春霞像福尔摩斯一样“侦查”了四年，与这些历史信息碎片有关的证据链被她一条一条地重建。“积累多了，我对宋人的感受也越丰富了，所以就将几年间写下的一些文章集结成一本书，取名叫《千面宋人》。”

仇春霞说：“要窥探一个人的秘密，私信无疑是个好东西；要了解人性的复杂、社会的利害，私信更是个好东西。”

但从书信中挖掘个体故事与人生百态的缘起为何？在“宋史热”中，这本书的突破点何在？将中国传统艺术研究的经验与史学视野结合，又会擦出怎样的火花？羊城晚报记者专访了仇春霞——



《千面宋人》封套

仇春霞（受访者提供）

【个人简介】 西南大学古典文学硕士，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学博士，专注于中国传统艺术的研究与传播。

壹 从信札看历史，颠覆“固有印象”

羊城晚报：宋代名士这么多，为什么只有一部分进入《千面宋人》？

仇春霞：写哪些宋人，决定权不在我这里：而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历史”，另一个是出版社。我的研究对象只是博物馆里的书信，而我本来是按时间顺序对存世书信逐一研究的，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说要先挑一部分出版，试试读者会不会喜欢，所以读者看到的《千面宋人》就呈现为目前这个样子。

羊城晚报：近年都在讲“宋史热”。与市面上已经出版的宋史著作相比，《千面宋人》有哪些鲜明的特色和不一样的切入点？

仇春霞：《千面宋人》的特色可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内容来自国内外博物馆所珍藏的宋人信札，它们都属于传世文物，我们讲述的就是这些信札背后的故事。读者读到的，并不只是故事，还可以了解到一大批文物知识；二是《千面宋人》的写法通俗易懂。全书极少大段引用原始文献，读者完全可以将它当成一部故事书来读。但著名学者刘墨先生说，要查证《千面宋人》里的史料来源，需要费很大的工夫；三是《千面宋人》所穿插的人物故事和社会信息非常丰富，有些甚至是闻所未闻的。比如苏轼去世前与大书法家米芾交往的细节、山药是如何在北宋士大夫群体中获得尊宠的、宋代福建人的进京路线、宋高宗是如何与高级将领抢人才的，等等。另外，有些人物形象会颠覆读者固有的印象，比如苏轼对一些人事近乎迂腐、欧阳修也有自私的一面等。在一些重要片段后面，我会作一些个人点评。

将历史人物写得生动有趣，是中国历史与文学写作非常优秀的传统。从《史记》到《三国演义》，再到当前比较火热的《明朝那些事儿》《翦商》等，这条河流从来没有干涸过，《千面宋人》只是这条大河里的一滴小水珠。

贰 读得多，史料会“自动成块”

羊城晚报：您将中国传统艺术研究的经验与史学视野结合，有怎样的火花和挑战？

仇春霞：这种结合让我非常愉快。作为一名艺术史研究者，我们会有一个普通的特质，那就是“蹲坑”——“蹲”一个主题、“蹲”一个系列，并且把对象当洋葱那样一层一层剥出来。但如果只是一名艺术史研究者，研究成果多半会是一部学术著作，比如我研究的宋人信札，结果有可能就是《宋代传世书信研究》。但是如果有“史学”思维，那就不一样了。它得解决两个问题：一是你想讲什么历史，二是你的观点是什么。

由信札牵引出来的“宋史”，它不是政治制度、经济制度、重大历史事件等，而是“事件”。反过来讲，就是什么事件导致了这封信的出现。为了讲清楚，我尽量用第三人称的角度来“讲述事件的过程”，不记流水账。在叙述时既不像《明朝那些事儿》那样充分调动作者的参与度，也不像《万历十五年》那样时时对事件或现象进行“评述”。

我这种写法会有难度，因为必须掌握丰富的史料，故事前后的衔接得靠细节来完成。

另外就是要找出一个角度来写，角度就是观点，没有观点，写史的意义就不大。所以我需要读很多史料，要不断提升自己的境界。这个过程虽然“费劲”，但经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因为读得多，史料就不再是碎片，它们会自动成块。

羊城晚报：您说花了四年时间“纸醉金迷”，精读文献，不断改写，这个过程最难的点在哪？

仇春霞：所有的难都在开头，包括如何查找文献，如何改写。等路径都熟悉了之后，就没什么难的，只需要花时间去完成就好了。而这个“时间”可能就是后面写作的一个难点。因为我不是专职作家，我还有单位安排的研究工作要完成，下班回家还有两个孩子要照顾，写作时间就非常有限。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会在陪小儿子的时候在脑海里整理材料，先打腹稿，等差不多成熟后再动笔。

羊城晚报：将历史信息碎片整合成一个个相对完整的故事，会不会个人加工、想象的成分很多？您如何平衡史实和故事性？例如后记写“宋人笔迹里的密码”，以笔迹揣度笔者的为人，肯定有些主观判断在其中，您怎么取舍？

仇春霞：我很少在《千面宋人》里加工故事。它之所以有趣，是因为我使用的材料很多都来源于宋人自己写的文集。其中的文章、诗词、书信等，都是宋人情感的产物，这注定了读者会与他们产生共情。宋人在编这些文集时，会有时间或逻辑上的关联，很多时候，我只要认真读文献就行，不需要过多揣测或加工。

我的立足点是传播宋代文化，所以我不能只是为了完成自己的专题研究。《千面宋人》里有很多故事是非常感人的，我不仅在写作时候会流泪，再读的时候也会流泪，比如《名将落魄之后》《东坡临终》《苏轼与章惇的恩怨情仇》等。

叁 靠本性与觉悟获得尊严

羊城晚报：宋代文人的人生百态、命运沉浮，对当前的我们有什么人生启示？

仇春霞：我不知道读者会从《千面宋人》里获得什么启示。我的感受是，每一位出现在宋代史料里的人物都有值得我们从正面或反面去思考自身价值的地方。因为能在青史留名的，都不是普通人。他们的成功与失败，既与历史大背景有关，也与自己的性格特点有关，与自己的抉择有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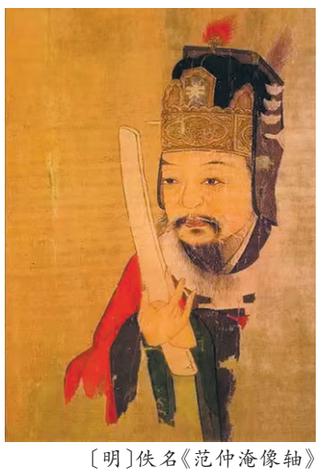
比如宋夏战争爆发后，范仲淹喊欧阳修同去前线打仗，欧阳修拒绝了。按理说，欧阳修丧失了一次载入史册的重要机遇。但为什么这并不影响他在历史上的地位呢？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他是文学天才，二是他在政治路线上紧跟韩琦，三是他持之以恒地研究历史。第一点是老天爷给的，他成为杰出的文学家；第二点是欧阳修自己的抉择，他当上了副宰相；第三点也是欧阳修选的，他成了杰出的历史学家。

相比苏轼，他没有“政治站队”的概念，也没有钻研一门学问的精神，他能活成“一颗巨星”，完全是自然成长的结果。但是苏轼在落魄的时候会反省自己，苦难的时候会安慰自己，在绝境中他会放过别人也放过自己，同时知道哪一条路是自己的活路。他正是凭借这点，从流放地活着回来了。其实对于我们普通大众来讲，很多人都“非天才”，所以，我们只需要把手上的事儿做好就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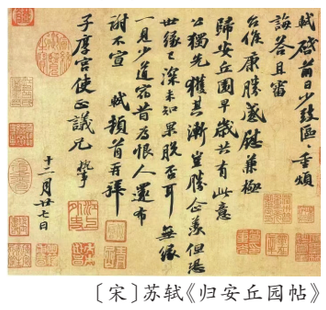
羊城晚报：您提到，那些被命运辜负却活出生命尊严的人同样值得被历史学家言说。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们可以将“宋代热”理解为一种对个体的再发现吗？

仇春霞：这个问题提得好。“活出尊严”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当然也不是特别难的事，主要还是看个人本性与觉悟吧。我举个例子。黄庭坚晚年被贬重庆，当他千辛万苦到达贬所后，心情非常不好。一来是物质上一无所有，还有一个大家庭需要他养；二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劳作后，他发现自己由一位尊贵的士大夫变成了一个黔州老农民，这让他非常悲伤。这个时候，一个名叫杨明叔的年轻人出现了，他想跟黄庭坚学习。杨明叔点醒了黄庭坚，身为士大夫，即使在最偏远的山区，他仍然能够传道、授业、解惑。孔子说：“君子居之，何陋之有？”黄庭坚改了一下，说：“国有君子，何陋之有？”从这个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到一名基层小干部和一个落难的士大夫是如何靠本性与觉悟获得尊严的。

再说一个故事。黄庭坚的儿子黄相的母亲是一位婢女，大半生都默默无闻、任劳任怨，操持着那个大家庭。黄庭坚从来不把她当夫人看待。在他心里，夫人是那两位已经去世的大家小姐。在那个时候，很多侍妾都无权拥有自己的孩子，孩子属于正夫人。可是到晚年，经过无数磨难后，黄庭坚看到了黄相母亲的不平凡之处，在一个大年三十晚上吃团圆饭的时候，他跟孩子们说：“以后你们都要叫她母亲。”所以，一个不识字的、身份低微的女人，也活出了自己的尊严。《千面宋人》是一本讲“人”的故事书，许多故事对我们都是有启发的。



〔明〕佚名《范仲淹像轴》



〔宋〕苏轼《归安丘园帖》